

唐宋史记接受史

俞樟华 虞黎明 应朝华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唐宋史记接受史

俞樟华 虞黎明 应朝华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史记接受史/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5

ISBN 7-206-03393-8

I. 唐… II. 俞… III. 文学史论 IV. L. 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785 号

本书由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唐宋史记接受史

著 者 俞樟华 虞黎明 应朝华 封面设计 陈丽英

责任编辑 李彦珍 校 对 陈 琳

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683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印 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393-8/L·313

定 价 27 元

如图书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绪论: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	(1)
一、历史的召唤:传统《史记》研究之反思	(1)
二、必然的选择:走向接受美学	(6)
三、概念之比较:接受史与批评史、研究史、传播史	(9)
上编 唐代《史记》接受史	(20)
第一章 唐代接受《史记》的社会条件	(23)
一、统治者的重视	(23)
二、士人们的功利	(27)
三、学者群的精研	(35)
四、全方位的传播	(40)
第二章 唐代史学对《史记》的接受	(45)
一、史学理论方面	(45)
二、史籍著述方面	(53)
第三章 唐代小说对《史记》的接受	(59)
一、唐代小说接受《史记》的先意识	(59)

二、唐传奇接受《史记》的外在表现·····	(67)
三、唐传奇接受《史记》的内在超越·····	(72)
第四章 唐代诗歌对《史记》的接受 ·····	(78)
一、传统主题的拓展深化·····	(78)
二、隐显有致的诗性涵容·····	(101)
三、潜移默化的人格化育·····	(109)
第五章 唐代散文对《史记》的接受 ·····	(116)
一、理论上的接受·····	(116)
二、创作上的接受·····	(121)
下编 宋代《史记》接受史 ·····	(135)
第一章 宋代历史文化情境 ·····	(140)
一、文化政策·····	(141)
二、文化建设·····	(148)
第二章 效果史研究 ·····	(152)
一、刻本史·····	(154)
二、选本史·····	(160)
三、说唱史·····	(164)
第三章 阐释史研究 ·····	(167)
一、编纂体例·····	(191)
二、班马异同·····	(201)
三、文章风格·····	(207)

四、史公三失·····	(212)
五、人物品评·····	(218)
六、考证史实·····	(234)
第四章 影响史研究·····	(237)
一、宋代诗歌与《史记》·····	(237)
二、宋词与《史记》·····	(249)
三、宋代散文与《史记》·····	(256)
四、宋话本与《史记》·····	(286)
五、史书与《史记》·····	(289)
余论 ·····	(302)
 附录 《史记》名篇接受史·····	 (310)
一、论唐代诗人对《史记·留侯世家》的接受·····	(310)
二、清代诗人对《伍子胥列传》的接受研究·····	(321)
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先唐接受史简论·····	(329)
四、唐代诗人对《史记·魏公子列传》的接受·····	(334)
五、《廉颇蔺相如列传》接受史综论·····	(341)
六、论清代文人对《屈原贾生列传》的接受·····	(362)
七、试论《刺客列传》接受史·····	(373)
八、历代文人对《货殖列传》的接受·····	(391)
参考文献·····	(410)
后记·····	(414)

绪论：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

《史记》研究两千多年来，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在新思想、新学说精彩纷呈的时代，在传统和现代相互碰撞的世界舞台上，传统研究是否依然光彩依旧？当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回顾《史记》研究走过的漫漫长路，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在成绩的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弊端；当我们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传统的《史记》研究发出挑战，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一场新的研究范式正亟待展开。

一、历史的召唤：传统《史记》研究之反思

《史记》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最早提出“史记学”之说的是宋人王应麟，他在《玉海》卷四十六《唐十七家正史》中指出：“司马氏《史记》有裴駰、徐广、邹诞生、许子儒、刘伯庄之音解。……《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根据他的记载，早在唐代，《史记》就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实，自《史记》问世以来，关于《史记》的评论就已散见在各类文集选本中，层出不穷地

出现。不同时代、不同价值观的研究者通过自身不懈地努力共同铺就了《史记》研究长达两千多年的悠悠长路。

首先，让我们一起回望一下这条漫长的道路。从汉代到清末，是传统的《史记》研究时期，历时两千年。期间，扬雄、班氏父子、卫宏、王充、王允、譙周、张辅、葛洪、裴骃、刘勰、魏徵、颜师古、刘知几、司马贞、张守节、韩愈、柳宗元、皇甫湜、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秦观、张耒、唐庚、沈括、郑樵、洪迈、王观国、马存、朱熹、吕祖谦、晁公武、倪思、刘辰翁、叶适、王若虚、罗大经、真德秀、魏了翁、林駉、王应麟、黄震、黄履翁、戴表元、王恽、马端临、方孝孺、郑瑗、王鏊、何孟春、杨慎、柯维骐、王畿、茅坤、唐顺之、归有光、王维桢、王慎中、徐中行、董份、胡应麟、茅瓚、余有丁、凌约言、何良俊、王世贞、李贽、焦竑、邓讜、李维桢、陈继儒、郝敬、于慎行、凌稚隆、钟惺、李廷机、陈仁锡、黄淳耀、陈子龙、徐孚远、王夫之、钱谦益、顾炎武、冯班、蒋中和、储欣、何焯、吴见思、方苞、董南纪、吴振乾、沈德潜、浦起龙、王又朴、汪越、徐克范、李晚芳、汤谐、杭世骏、吴楚材、刘大櫆、牛运震、王元启、王鸣盛、邵泰衢、纪昀、袁文典、赵翼、钱大昕、邱逢年、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杨于果、高嶠、梁玉绳、林伯桐、林春溥、王筠、丁晏、程余庆、吴敏树、曾国藩、郭嵩焘、尚镛、潘永季、李慈铭、吴汝纶、沈家本、刘熙载、张文虎、林纾、崔适等共 385 名学者，发表论文 1435 篇，论著 101 部（统计数字摘自郑之洪著：《史记文献研究·序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 年）。学者们通过微观的文献研究，在《史记》的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语意疏解、笔法评点以及体例源流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为后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到近代，以王国维为首的一批学者利用出土文物对《史记》所记载的历史及司马迁的生卒年等

进行详实的考据,开启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笠《史记订补》、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靳德峻《史记释例》、吴国泰《史记解诂》、朱东润《史记考索》、李奎耀《史记丛考》、余嘉锡《太史公亡书考》等专著继乾嘉学派之遗绪,在考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建国后,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涌入,学者们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纷纷借鉴新学说、新思想,对《史记》开展多角度多层面的全方位研究。研究者以史学与文学为两大主轴,“从美学、民族学、伦理学、法学、心理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军事学、人才学、档案学、宗教学、政治学、教育学、农学、音乐学、礼学、经学各个角度研究《史记》,揭示出《史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特殊价值”,^①有力地推进《史记》研究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发展。两千多年的《史记》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史记》在这一代代学者的阅读、疏解、评论中也逐渐显示出其丰厚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可是当我们带着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反思这段历史时,它的不足之处也就显而易见了。

一方面,它将眼光驻足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两千多年来始终在传统路子上艰难徘徊。不管是封建时代以考据、评点为主的微观研究,还是 20 世纪的文学、史学、文化等全方位的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读者的一席之地。前者侧重于挖掘《史记》的历史文献价值,考证《史记》中事件与历史的关系,考察文本的符号系统。这样的研究既无法揭示《史记》所展现的过去时代人类精神状态的发展演变,也没能告诉我们文本的美学特质与文学性之

① 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1 年第 1 期。

所在。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史记》首先是一部史书,因此对于它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史实的疏证、文字的考订,但这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而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而后者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趋势,但无论是对《史记》的社会背景、《史记》形式结构的研究,还是对司马迁的创作心理等的研究,仍然只是换汤不换药的传统方法。尽管研究推进了一层又一层,成果出了一批又一批,但也难免不存在着老调重弹、视角单一等诸多缺陷。研究者视《史记》为永不变更的客观存在,企图通过自身的论述获悉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达致永恒的客观真理。而这,恰恰违背了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①因而,任何自以为客观的研究其实在不自觉间已掺入了批评者所处时代的情感思想和批评者当下的生命体验。无论是选题、对材料的分析,还是炼字、组词等,这本身就已是一种判断、选择。《史记》是司马迁的呕心沥血之作,是司马迁情感的符号,生命的形式。对于这样一部著作,读者的解读又怎能不带丝毫的情绪体验的成分?在文学研究领域,任何绝对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更无所谓什么绝对的永不变更的客观真理。本文作为一个多层面的开放的图式结构,它的意义与价值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史记》。如此看来,如果不首先对读者接受的动机、阐释

①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的尺度进行询问、反思，我们又怎能知道这样的接受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审美规律，是否值得后人借鉴？因此，从读者的角度重新思考《史记》，就成为我们正视历代批评，正视文本的前提之一。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多停留在静态的、共时的分析中，从而割断了《史记》与历史的联系。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司马迁，他们在漫漫长路上经历着怎样的命运呢？是否在问世之初就已享有至高的荣誉？产生《史记》的年代及《史记》反映的年代都已离我们远去，而《史记》为何能脱离这一切，继续流传下来，并成为一种典范而得到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永久的青睐？一直以来，我们将《史记》放在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立的背景中，围绕文本与作者作横断面的分析，而将文本的历史本质置之不闻，造成文本与历史的断裂。但是，《史记》作为文本结构，是司马迁及过去时代人类审美精神状貌的符号化形式，它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思考才显现出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赋予与实现要依赖历代读者的参与接受。后人之所以要一遍遍地阅读《史记》，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提倡重读经典，并不在于认知性地获得关于过去的某个历史事实，而是为了从中寻找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指导当下更好的生存和奋争。人们以当时的价值尺度审视过去的历史，因此这种重读就会因各个时代价值标准的不同而赋予文本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一代有一代的读者，一代有一代的《史记》。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品本身在效果史的背景上会呈现丰富的‘语义潜能’。一部作品的意义潜能不会也不可能为某一时代读者或某一个别读者所穷尽，只有在

不断延伸的接受链条中才能逐渐由读者展开。”^①《史记》丰厚的意义与价值正是蕴藏在历代读者的主观意念中。如果不首先对读者的接受轨迹进行描述分析，我们又怎能知道《史记》丰厚的意蕴在不同时代所激起的不同回响？怎能知道人类审美规律的发展演变？因此，构建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微观宇宙，走向《史记》接受史研究，填补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空白，早有提到研究日程的必要了。

二、必然的选择：走向接受美学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西方当代批评在 19 世纪盛行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后，经历了作者中心论和本文中心论的理论阶段。他们以自己片面的深刻性，独步文坛，分别在一段时期内左右着理论界的文学批评。然而，60 年代以来，无论是作者研究还是本文研究，无论是文学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都已经无法回答文学现实提出的新难题，他们必然地走向穷途末路。如何在文学与历史、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何在文学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此时，接受美学的崛起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为解决难题应时而出的产物。

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又称“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接受与效果研究（Rezeptionsforschung）”，它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其创始人姚斯、伊瑟

①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厚诚、王宁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第 341 页。

尔在西方现象学、解释学的基础上，融合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伊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众多学说之长，开创性地提出以读者为中心的崭新的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一，文学作品不同于文学本文。在还未经读者参与介入前，本文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图式结构，而文学作品的实现则要靠读者的挖掘与创造，通过阅读使之具体化。第二，在上述过程中，读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文学本文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依赖读者的阐释。“读者对本文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第三，读者对本文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在此过程中，读者的主观意识、读者的具体化永远是第一性、处主导地位的因素。由此，姚斯提出“文学史应是文学作品的接受史”，而读者便是这部新文学史的仲裁人。^①接受美学自崛起之后，随即西进东渐，应用于各国文学研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尽管目前该理论并未拥有一个完善的全面的体系，即使是姚斯、伊瑟尔这两位接受美学的双星，他们的著作中也存在着或者前后自相矛盾，语焉不详，或者概念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毛病；尽管该理论过分突出读者的地位、作用，把文本好坏优劣的决定权统统交给读者，由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生活阅历、不同趣味动机的读者裁定，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泥淖。但是不可否认，它的出现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它一反过去的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跳出了作者与本文研究的狭小圈子。它将关注的视角投诸于读者，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读者，重视文本的历史本质。它试图通

① 参考[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过对读者接受轨迹的梳理,探究文学的发展规律与审美规律,从而将美学研究与历史分析有机融合在一起。这不仅是研究方法 with 视角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世界观的转变与更新。它的创立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气息,在文学领域内掀起了一阵巨大的波澜。

80年代,接受美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开始得到我国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应用。1987年,周宁、金元浦将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的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学》和接受美学的导论性著作——美国霍拉勃的《接受理论》合译成一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这是我国第一本接受美学论著,它对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张廷琛选编的《接受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刘峰、袁宪军等人编译的《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等论著相继翻译出版,大大促进了学者对接受美学的研究与运用。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杨文雄《李白接受史研究》(台湾成功大学,1998年版)、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成功地将接受美学运用到古典文学研究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史记》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做得还很欠缺,不仅没有专著,单篇的论文也很少,这确实为一大遗憾。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对《史记》接受史进行研究,这不是去迎合当下的时尚,不是为了赶潮流,而是历史的召唤,是《史记》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了接受史研究之外,其它角度的《史记》研究可以不要,不是的。恰恰相反,这些多层面的分析为构筑《史记》接受史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巨大资源。《史记》的意蕴

也正是在这一代代批评家的分析、阐释中逐步展现的。没有这些具体而微的研究,《史记》接受史也就无以为据,无从谈起。可幸的是,目前,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资料的汇集已有不少,如明朝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清朝程余庆的《史记集说》,今人杨燕起等人编的《历代名家评史记》,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陕西学者正在进行的《史记研究集成》等,皆辑前人注释、评论为一书,为《史记》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这还只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接受史研究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这些批评家的评论,还包括普通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创作者对文本的模仿、借鉴等多个方面,这些都需要我们花大精力来搜集、整理,从庞杂丰赡的文献中搜罗剔抉,从历代读者的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中一一拾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前提下,将文本置于历史序列中,在共时态上把握司马迁及《史记》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形态,在历时态上考察《史记》在历代的声名显晦、阐释评价、创作影响等等,进而窥探人类审美规律的发展演变史。这应该是 21 世纪《史记》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概念之比较：

接受史与批评史、研究史、传播史

接受史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独立的文学研究方法,它在实践运用中逐渐显现出深远的学术意义和广阔的学术前景。在进入这一学术领域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廓清几个相关的概念,以期进一步明确接受史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体系中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关于接受史与文学史、批评史的关系。朱立元、杨明在《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一文中指出:“接受史或效果史是沟通文学史和批评史之间的桥梁:文学史提供基本素材;效果史主要历史地描述读者群体对作家作品反应批评;批评史则是效果史的理论概括形态,主要是对古代文学理论、观念、范畴、方法的历史考察。批评史提供了效果史形成的理论框架,效果史也从读者接受方面对文学史的发展趋向产生制约作用。效果史既联接着文学史(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析),又联接着批评史(由具体评析上升为范畴、命题、观念、理论),起着中介、枢纽的作用。”总之,这三者既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特点,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文学史重在对文学现象和具体作家、作品的陈述评析,它是接受史研究的基础,并为接受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批评史则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它为我们对历代接受状况的考察提供了理论指导。

其次,关于接受史与研究史的关系。对此,陈文忠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中有精当的论述,他认为“从对象范围看,研究史涉及的范围大于接受史。研究史的范围,除了历代评论家对作品的不同分析评价外,广泛涉及到版本源流、本事考证、成书过程、作家的生平事迹等内容。接受史以审美经验为中心,集中考察历代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反应,进而窥探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并寻求其变化的原因,等等。”两千多年的《史记》研究史囊括了对《史记》各篇内容和艺术成就的研究、《史记》编纂体例、取材的研究、《史记》流传、影响的研究、《史记》与《汉书》等的比较研究、司马迁生平的研究、《史记》版本的研究、《史记》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章、地理沿革的考证研究,等等。而《史记》接受史研究主要考察历代读者对《史记》思想艺

术的审美反应,上述的作者生平研究、版本研究、考证研究等内容显然已远离审美经验的范畴,不在接受史的范围之内。其次,从主体态度看,研究史偏重客观科学的整理,接受史则强调主观能动的阐释。研究史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某一阶段学术成果的总结和整理,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积累经验。它要求研究者要全面客观地揭示问题,对复杂的材料加以科学地整理和概括,以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相反,接受史研究侧重于在过去和现在,历史视野与现实视野之间找到交融点,挖掘经典作品的当代性。作为一名接受史研究者,就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当下审美体验融入生生不息的接受史中,从而才得以进一步窥探人类审美趣味的发展演变过程。

再次,关于接受史与传播史的关系。传播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重要活动,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传播活动就一直存在着。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却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由许多环节组成。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

谁(传播者)→说什么(讯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给谁(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

尽管拉斯韦尔是站在传者的角度来研究传播过程,但他提出的这五个W模式却构筑了传播史研究的基础和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威尔伯·施拉姆在对前期的“靶子论”、“有限效果论”、“使用满足论”等怀疑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传者与受者双方互动的传播模式。他指出:“在一段时期以来,(传播模式)逐渐从考虑一个传播者如何作用于一个接受者,变成考虑一个接受者是怎样对待传播。”传播学研究由最初的传者向受者